

朱 理 治

朱理治，原名朱铭勋，曾用王志、李迅、朱煌岗等化名。1907 年 7 月 25 日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县余西镇。父为当地著名中医。1922 年考入江苏省立第七中学，8 个学期考试，分数皆为第一。1926 年考入清华大学经济系。1927 年 4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当选为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1927 年 10 月，调到中共北京市西郊区委工作，曾任区委书记、市委委员。1928 年春，中共北京市委遭到破坏，幸得以脱身，经冯仲云等同志掩护到南方找党。在家乡建立了党支部，当年 7 月，因坏人告密被捕，在南京、苏州看守所坐牢两年。这期间，他担任了这两处狱中的党支部书记和同难会长。1930 年 4 月出狱，在上海发起成立社会科学研究会，并建立无线电台支部。1931 年后，朱理治历任共青团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书记，中共河北省委组织部长、代理书记、副书记。1935 年 6 月至 11 月，担任中共上海中央局及北方局驻陕北代表团书记、陕甘晋省委书记。

朱理治在陕甘晋苏区工作期间，在肃反问题上曾犯过严重错误。但他接受了党的批评，在保卫苏区和迎接党中央、中央红军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他决定并支持打劳山战役和榆林桥守敌，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苏区的“围剿”，从而巩固了苏区，保卫了苏区人民。

1935 年 10 月底，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党中央调朱理治任陕甘边省委书记，李富春为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朱理治认为李富春比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己更有经验，主动向中央提出与李富春职务调换，未被允许。在朱理治、李富春等同志的领导下，分配了陕甘边土地给广大贫苦农民,并创建了红二十九军,发展党员 3000 人,壮大了革命力量。

1936 年初，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 中央工委 ”),成员有周恩来、叶剑英、边章伍和朱理治。周恩来任书记，朱理治任秘书长。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我党争取东北军团结抗日的工作取得很大成就。不久，中央红军东征，陕甘边省只留了两个连主力部队，李富春调赴前方。朱理治和省委其他同志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和毛泽东指示，在红区边界对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首先与东北军一〇七师师长及参谋长进行联络，并动员红军士兵与东北军士兵进行联欢活动，以增加相互的感情，和平共处。毛泽东率红军东征大部队后，十分关心留守的红军与东北军的关系，在党的刊物上读到了朱理治写的对东北军搞统一战线的经验的文章，直接给朱理治写信鼓励并作了新的指示，对朱理治的工作给予很大的推动。

由于蒋介石逼迫东北军向苏区进攻，红军与东北军约好唱双簧戏,假打一下,以使东北军向蒋应付。1936 年 6 月,中共中央决定朱理治到西安东北军中工作，任党中央特派员，领导东北军中的党的工作委员会(简称‘ 东工委 ”)。

这时张学良的部队在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在全国抗日高潮的推动下，已经与红军建立了秘密的友好关系。朱理治于 8 月底到达西安，首先向东工委的同志传达中央对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说明民族矛盾在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将退为次要矛盾，我们的工作不是消灭东北军，也不是将东北军变为红军，而是将其变为抗日友军，使东北军地下党的负责同志受到很大启发。接着，朱理治着手加强东工委的领导，增加巡视员，增设了组织部和宣传部的副部长。工作联系主要通过个别接头来完成，在必要时召开会议，使会议制度和工作纪律健全起来，这对东工委的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东工委的组织虽然不大，但活动的范围很大，其

成员积极工作，热情很高，在许多群众组织和各方面的活动中起了积极的领导作用。

朱理治还请示上级批准刘澜波、宋黎等参加张学良组织的东北军的政治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以推动东北军逼蒋抗日。赞成并支持东工委已着手进行的对东北军上层人物的统一战线工作，加速了这项工作的进展。

1936 年 10 月，朱理治来西安后，东工委发起正式成立了东北民众救亡会，使之成了团结东北流亡群众，推动东北军走向抗日的重要团体，同时也给西北抗日运动以很大的推动。朱理治领导东工委的同志根据中央的指示，扩大援绥抗战运动。由东北民众救亡会发起募捐，并派代表去绥远慰劳，鼓舞了广大群众和前方将士的抗日斗志。随着抗日运动的发展，在西安，除了《西京日报》(国民党报纸)以外，我党领导与影响下的《西京民报》等各种报纸，都扩大了援绥抗战的宣传，通过西安文化协会与文委的努力，冲破了过去西安文化界的沉寂空气。东北民众救亡会把抗日宣传扩大到驻西安的东北军。由于抗日运动的高涨，西安有 20 多个团体发起成立绥远抗战后援会，广大群众进一步看清了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反动。这时十七路军的抗日情绪也不断高涨，和东北军一同保护救亡运动。东北军王以哲、吴家象等人，还担任了东北民众救亡会的理事，总部的处长、科长参加的也不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朱理治还通过刘澜波说服黄显声将军加入抗日同志会，并担任一一九师师长职务。这不仅促进了东北军上层的团结，而且利于党组织在其部队中发挥作用。

绥远抗战爆发后，朱理治经常与宋黎接头布置工作，以指导西安各界群众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每天都有学生在街头讲演和为绥远抗战募捐。这种积极支援抗战的气氛，直接促成了“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时西安大批学生向蒋介石请愿的活动。这些活动加速了形势向前发展，促进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1936 年 11 月，因苗淳然、刘澜波先后离开西安，朱理治要宋黎代理东工委

书记，以利东北军中的中共组织开展好工作。毛泽东对东北军内党组织的活动及抗日力量的成长壮大十分关心，曾直接发出具体指示。1936 年 12 月 5 日，毛泽东在给中共驻东北军代表刘鼎的电报中就明确指出“：学生队(指东北军学兵队——引者注)的教材,可请理治编 ”。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等到达西安，朱理治向周恩来汇报了来西安后的工作情况。按周恩来的指示，朱理治参加了中共陕西省委的工作。由于朱理治和东工委同志的努力，在西安事变过程中东北军内的中共组织迅速地发展壮大，由 20 几名党员发展到 210 多名,每个师中都有党的支部。在各个重要机关内,有许多同志在为党的统一战线而工作。在党内，则不断克服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和狭隘的宗派关门主义，保证了党的路线的执行。

朱理治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就患重感冒，因忙于紧张的工作久拖未治,到 1937 年 1 月,病情加重,转为肺炎,住进西安的省立医院。2 月 2 日,东北军内部发生‘ 二二 ’事件,王以哲将军被杀害,东北军内部矛盾加剧，中共中央代表团部分成员撤离西安，东工委送朱理治到三原养病。这时，东北军中有人拉队伍到红军中来，朱理治得到周恩来的指示后，根据党确定的团结东北军抗日的原则，立即通过各种方法加以说服和制止，把保证东北军的内部团结作为党的一项重要任务，以此来巩固友军，继续团结东北军抗日。同时促进东北军上层人物进行内部的调解与联合。并用对东北各阶层群众的统一战线工作，来推动我党我军与东北军团结抗日。但在这新形势下，单凭做东北军内部的工作显然是不够了。 1937 年 3 月 23 日,朱理治在题为《关于东北军工作近况及新的布置》这份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报告中提出：“ 用东北民众的统一战线，来推动东北军的团结 ”; 重新组织东北民众救亡会,并准备召集全国各东北救亡团体联合会，用群众的力量来巩固内部的团结。这种团结务要做到使各实力派及各个学派都能参加 ”。这样的布置是密切联系实际、非常正确的,因而得到了党中央和周恩来的同意。

“二二”事件对中共在东北军中的工作造成较大损害。东北军东调后，朱理治对东北军中中共组织的工作作了布置：一、把党的组织进一步建在基层部队中，以利于部队在分为单独、较小的单位时,能够独立地工作；二、将党内,首先是学兵队内最好的干部,派到各师的支部中去；三、“二二”事件后,分配到各部队中当宣传员的学兵队员被迫撤了出来，朱理治和东工委的同志与东北军主要将领联系，通过种种方法把这批革命青年安排进东北军各师；四、改变党的活动方式，党员尽可能在外表呈灰色，一切活动务要注意到不使先有基础的部分暴露出来；五、改组党的领导机关，决定东工委由项乃光(后来叛变)与高锦明负责,随军东下。东北军上层工委与东工委平行，受党中央的直接领导。4 月间,朱理治由三原到西安见到了住在七贤庄的周恩来，把东北军改组及今后工作的布置情况向周恩来作了详细的汇报。朱理治还参加了在西安召开的东工委总结工作会议，并提出了指示性意见。由于朱理治在西安这一时期认识人较多，刘澜波、宋黎也太引人注目，不利于在新的环境里开展工作,3 人都没有随东北军东去。刘、宋调北方局分配工作。4 月底,朱理治回延安,参加中共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

在白区工作会议期间，中央决定重建河南省委，指定朱理治任省委书记。毛泽东在与他谈话中指出，河南将是抗战的重要战略地区，要抓紧时机，在各方面做好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河南省委成立后，立即根据党中央的战略决策，迅速开展工作，并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扩大了中共在河南各阶层人民中的政治影响，党的各项工作都得到蓬勃发展。省委开始设在开封，以后到了竹沟，朱理治受党中央委托代管东工委。1938 年春东工委撤销，东北军各军中的中共组织归所在地的省分局、中央局、中央分局领导。

朱理治在领导河南省委和主持中原局日常工作时，多次派人到国民党一、五战区及所属的党政军民组织，包括战区司令长官、省政府主席、地方实力派、地方士绅等处联络，广泛进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活动，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和统一战线政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扩大了我党的影响，争取了抗日力量。1938 年 6 月初,朱理治到达确山县竹沟,与彭雪枫、王国华等会合,以竹沟为据点,吸引和招收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抗日战争，并以开办党校、教导队、青训班等各种形式，为中原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培养和输送了 3000 余名干部。竹沟被誉为“小延安”,成为中原地区发动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战略支点。

1938 年 9 月，朱理治回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全会重申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原局，朱理治受命担任中原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于 11 月下旬同刘少奇、李先念、郭述申等一起离开延安，重返竹沟。1939 年 4 月,刘少奇从竹沟回延安后,朱理治代理中原局书记主持日常工作，重大问题则向刘少奇请示。这一阶段，他协助刘少奇贯彻执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规划指导豫鄂边区党的工作，部署新四军游击武装向武汉外围挺进，为这个地区抗日游击武装的汇合，实现党和部队的统一领导，为新四军豫鄂地区主力部队的创建，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40 年 1 月 3 日,以李先念为司令员、朱理治为政治委员、刘少卿为参谋长、任质斌为政治部主任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正式建立。从此，豫鄂挺进纵队作为一个有重要意义的独立战斗单位，高擎抗日大旗，活跃在豫鄂边区广大敌后抗日战场上。同年 3 月，朱理治作为中共“七大”代表奉调回延安。在离开边区之前,他与纵队和区党委其他领导同志一起，对豫鄂边区的部队工作和地方工作，做了全面的安排。这些安排对巩固和发展豫鄂边区的部队和地方工作，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解放战争时期,他致力于东北的经济工作和政权建设,曾任中共中央北满分局秘书长，东北银行总经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他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为党为人民做了大量工作，成绩卓著，曾任交通部副部长和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到“四人帮”的打击与压制,身心受到摧残。平反

后，在投有职务的情况下，他仍深入农村，为党工作。

1978 年 4 月 9 日，朱理治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 71 岁。

朱理治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在西安工作期间，坚持党组织的秘密性，依靠地方党组织，为发展壮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和加强东北军中中共组织的力量，开展党的工作，推动东北军联共逼蒋抗日，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

主要参考资料：

刘子久、任质斌等：《朱理治同志在发动中原抗日游击战争中的业绩》，《人民日报》1985 年 12 月 20 日第 5 版。

朱理治：《自传》，1944 年 11 月 8 日。

朱理治：《干部履历表》，1964 年 10 月 28 日。

（赵东阜整理）



刘 澜 波

刘澜波，原名刘玉田，字澜波，1904年出生于辽宁省凤城县鸡冠山茨林子村。

刘澜波少年时就读于凤城、沈阳等地。1919 年，刘澜波升入初中不久，因和同学一起高唱反日歌谣,被学校教务主任斥为‘有碍邦交”,刘澜波据理争辩，竟被以“扰乱教学秩序、顶撞师长”为由开除学籍。

1920 年，刘澜波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在这个有着光荣反帝反封建传统的学校里，他的思想受到了良好的熏陶，并在参加抵制日货和声援“五卅”运动等反帝爱国革命斗争中，逐渐成熟起来。1926 年，经安烈元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考入了北京大学政治系。1928 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 年，就在他临近大学毕业之时，由于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第一次遭到反动政府的逮捕。

1931 年春，经族兄刘多荃介绍，刘澜波到山西省政府主席商震处任秘书。他对东北时局的变化一直非常关注，就在其准备回东北时,爆发了‘九一八’事变。随后,张学良将东北的军政中心从沈阳西迁锦州，并授命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组织从东北撤退到北平的部分军政人员迅速返锦。经同乡的介绍，刘澜波结识了黄显声，他毅然同黄赶赴锦州，在省政府任秘书。

刘澜波为人正直，有胆有识，而且极富热情，深受黄显声的器重。在组建各种形式的东北义勇军的工作中，刘的建议常被采纳。在刘澜波等人的协助下，黄显声在短短的两三个月中就组织了 20

余路民众抗日义勇军，先后镇压了受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直接扶植支持的凌印清、张学成两支声势颇大的汉奸队伍。

1931 年 11 月中旬，日本关东军准备向辽西发起进攻。这时，刘澜波一方面随黄显声到大凌河一带检查布防，另一方面又积极协助黄显声调集各地义勇军埋伏于新民县西部青岗子一带阻击西侵日军，使日军西侵第一次遭到失败。

锦州失陷后，刘澜波随黄显声部撤入关内。刘澜波向中共河北省委（即后来的中共北方局）就黄显声等东北军部队的情况作汇报后，河北省委派刘澜波回到黄显声任师长的骑兵第二师，以黄的秘书身份为掩护，开展党在东北军骑二师等部队的军运工作。

在刘澜波不懈的工作和现实斗争的教育下，黄显声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不仅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还与刘澜波商量，恳切要求共产党派党员到骑二师来，帮助改造、建设部队。经刘澜波向中共北方局请示后，党组织先后派孙志远、白坚、康少逸、宋吉文、易广居、朱大光、刘景祜、李涤尘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到骑二师，建立了中共骑二师工委，白坚任书记，刘澜波任组织委员，兼做上层统战工作。

为了培养抗日骨干，刘澜波向黄显声建议，从青年军官和流亡青年中选拔一批进步分子，办一个教导队。黄采纳了刘澜波的意见，并指定由他任教导队队长，孙志远、康少逸等任教官。这个教导队为骑二师迅速培养了一批抗日骨干。刘澜波不顾非议，改变了以往兵运工作“要兵不要官”的做法。师工委确定了上下层工作同时开展，在广泛争取广大官兵抗日的同时，逐步改造这支部队的工作方针。

刘澜波在骑二师的上层统战工作中，除团结了师长黄显声之外，还争取了参谋长董道泉及几名团长。由于黄、董等人的思想不断进步，他们积极按照中共的建议对部队进行改造，在他们的支持下，师工委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师工委在发展组织的同时，又建立了士兵委员会等组织，使官兵关系出现了许多新气象。与此同

时,部队加强了军事训练,素质有很大提高,抗日斗志不断增强。因此,蒋介石、何应钦等人称骑二师为“红到底”部队。

1933 年 4 月，张学良将军被迫辞职出国后，何应钦与北平宪兵三团遂密谋采取特务手段捕杀骑二师的共产党员。一次，刘澜波与孙志远在北平隆福寺附近被宪兵三团特务跟踪，在非常紧急的情况下，刘澜波以牺牲自己的精神机智地掩护了孙志远脱险，但自己却被捕。在被宪兵三团拘押中，他严词驳斥了敌人的威逼利诱，表现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最后经黄显声、刘多荃出面奔走将他保释。

骑二师工委是中共在东北军中较早建立的组织之一，刘澜波也是中共最早与东北军高级将领接触并在开展统战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的共产党员之一。

1934 年张学良回国，被蒋介石任命为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此时，刘澜波曾去武汉面见张学良，除了向张诉说几年来流亡到关内的几十万东北人苦不堪言，东北军更是受尽歧视与侮辱之外，还向张介绍了骑二师官兵抵制了国民党的威胁，决心做抗日准备的情况。最后他明确指出，只有抗日复土才是东北军的唯一出路！张学良听后非常激动，当即表示：东北人就是要有下地狱的精神才能复土还乡！

1935 年,张学良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后,成立了骑兵军,委任黄显声为副军长兼参谋长。这时，刘澜波一面积极协助黄显声在骑兵军中传播联共反蒋抗日的政治主张；一面又在骑兵军内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并在七团建立了中共组织。由于刘澜波的努力，在黄显声等人的支持下，使骑兵军成为当时东北军驻陕部队中唯一没有和共产党红军发生过任何磨擦的部队。国民党往骑兵军派特工人员也受到了骑兵军的坚决抑制。后来黄离开骑兵军时，特介绍刘澜波到总部四处任科长，委托刘澜波“将党的政策向张学良诚恳的解释”。此后,刘澜波在西安更加广泛、深入地在东北军中开展统战工作。

1936年4月，中共北方局在西安成立了党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工委),刘澜波任书记,苗沛然任组织部长,宋黎任宣传部长。这样，东工委把分散在东北军工作的党的力量集中起来，统一领导,确定了“团结改造东北军,增强抗日力量,争取东北军早日转变到抗日战线上来”的工作方针。因后来形势发展迅速，七八月间，东工委又改由党中央直接领导，由当时兼任白区工作委员会书记的周恩来负责，派朱理治为特派员指导东工委的工作。刘澜波在领导东工委期间，不遗余力地为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积极地工作。

刘澜波与东北军中上层军官和一些东北名流有着广泛交往，除黄显声、刘多荃等外,其他如爱国将领王以哲、董英斌、赵国屏，团长吕正操、万毅、陈大章、董道泉、康博缨、高福源,爱国人士阎宝航、高崇民、车向忱、卢广绩等人,都和刘澜波有着亲密的联系。在与他们的密切交往中，刘澜波既能坚持党的原则，又能以真挚的感情推心置腹，所以许多人都把他当作知己。在他不倦的工作和促进之下，这些人的进步思想又不同程度地在整个东北军中甚至对张学良本人产生影响，从而使中共的方针政策得以有力的贯彻。在此期间，他还不失时机地向张学良阐明中共的抗日主张，张学良深为赞许。

1936年1月，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会谈后，张学良接受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为了培养青年抗日骨干军官，改造东北军,6月,张学良在王典镇办起了军官训练团,刘澜波带领贾陶、解方、栗又文等,参加了干部连的训练,并领导了军训团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训练团进一步提高了东北军与十七路军广大官兵的联共抗日思想，对这两支部队后来与共产党红军形成“三位一体”的革命大联合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9月，东工委协助张学良在西安城内办起了学兵队。由宋黎负责领导。学兵队开学时，刘澜波应邀在大会上讲话，他演讲的感染力和鼓动性，激起了与会者强烈的思想共鸣，把大会开成了一次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果极好的抗日救亡动员会。

1936 年 8 月底,西安城内发生艳晚事件。刘澜波得到通知,国民党捕人的黑名单上有他和孙达生等人。刘澜波一面迅速处理文稿、信件等秘密材料,一面让与他同住的孙达生先隐蔽起来,由他自己顶着去打官司。在军警联合督察处的法庭上,刘澜波正气凛然,驳斥了国民党特务侦缉处长蒋雄飞的种种诱供和威逼。由于特务拿不出什么证据来,张学良也就放心地将他由军警督察处转到了东北军军法处。不久,张学良让宋黎请卢广绩、车向忱保释,后来黄显声也出面保释。

1936 年 9 月,为了组织东北军的抗日力量,加快抗日步骤,张学良成立了一个秘密政治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并亲自担任会长。共产党对这个组织采取了积极支持的态度。刘澜波、宋黎、栗又文、苗淳然等经党组织批准参加了这一组织,由刘澜波指定栗又文参加起草会章。刘澜波所领导的东工委在认真贯彻中共中央“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和推动张学良及东北军进行逼蒋抗日的各种活动中,把党在东北军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刘澜波自在东北军中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以来,还对许多军官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热情的帮助,使他们不断地提高联共抗日觉悟,同时也赢得了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其中一些人后来坚定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与此同时,他又根据不同条件在一些部队中分别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

骑兵军七团团长陈大章,受刘澜波的思想影响较大。为了帮助七团提高政治、军事素质;“一二九”运动之后,刘澜波曾启发陈去北平招收了一些进步学生充实部队。这批学生中有几名共产党员,在七团成立了党的支部,由刘澜波直接领导。

五十七军六二七团万毅团长是一个坚决要求抗日的青年进步军官,和刘澜波建立了深厚的友情。他经常向刘澜波谈自己的思想,以便得到及时的帮助。在万毅的主动要求下,刘澜波、宋黎通过

东大党组织和东特委从北平等地调来一批进步学生送到万团。这批学生在积极参加军事训练的同时，还在部队中教唱救亡歌曲，出墙报,教士兵识字,给士兵写家信,开展各种抗日宣传工作,使部队变得生气勃勃。后来万毅发动了锄奸运动，带领部队走上了革命道路。

早在骑二师时就受刘澜波影响很深的骑兵第十六团团长董道泉，在刘澜波的帮助下，思想进步很快。他曾主动要求派共产党员到他的部队中去开展工作。刘澜波派宋任远等到董团后，董一直非常尊重共产党的意见，按照共产党的意图指挥部队。

1936 年秋，贺龙、任弼时所率领的红二方面军到达陇东。这时，蒋介石除命令胡宗南部进行围歼外，还调部分东北军阻截。当董道泉接到西进‘剿共’的命令后,一面派人将‘剿共’计划秘密送给红军，一面派人请示刘澜波，询问应付的办法。由于董团长的密切配合，使红二方面军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得以安全转移。

西安事变发生之前，张学良因担心在河北的五十三军万福麟部发生变故，决定派黄显声任五十三军副军长兼一一九师师长，俟适当时机取代万福麟。黄显声向张学良坚请刘澜波与之同行。他们到石家庄后，刘澜波即协助黄显声采取坚决的态度着手改造五十三军，还从冀南邀请部分共产党员参加了该部的工作。按照周恩来与张学良会谈所作出的决定，五十三军准备配合冀绥方面的红军作战。

西安事变爆发后，黄显声坚决主张五十三军沿京汉线南下直驱郑州，以牵制国民党攻陕的军队，但遭到了万福麟的强烈反对。正在这时，南京政府派高惜冰、黄恒浩来到五十三军游说。黄显声请刘澜波与他一起对付这两个说客。刘澜波据理驳斥了高等大谈其‘党国’‘主义’‘领袖’等滥调。四人争辩一夜,高等终于理屈词穷,第二天一早,就悻悻地离开了五十三军。

张学良送蒋被扣后，东北军内部产生严重分歧，主战主和等意见很难统一。刘澜波在这种形势下回到西安，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

下从事挽救局势的工作。

1937年2月2日，西安城内发生了少数不顾大局分子杀害王以哲的事件。接着，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枪杀了对联共抗日有重要贡献的高福源团长，扣押了积极拥护联共逼蒋抗日的康博缨团长。五十七军军长缪澂流也扣押了万毅团长。缪、刘还在高陵修筑工事，把炮口对准西安。在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刘澜波受周恩来的派遣偕同受杨虎城将军指派的卢广绩等人，去高陵做缪、刘的工作。刘澜波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工作，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做出了贡献。

东北军东调后，刘澜波同宋黎按党的指示于4月间先后撤离东工委，到北平参加中共北方局领导下的工作，刘任东北特委上委书记，宋任群委书记。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在形势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迅速将在平津一带的抗日救亡团体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在党领导下的团结更加广泛、联系更加紧密的抗日统一组织，努力团结东北军，争取张学良将军恢复自由，推动东北军继续抗日，发动各阶层民众促蒋抗日。经过一个阶段的筹备，1937年6月20日，各界代表上千人云集东北大学，正式成立了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简称“东总”)。中共北方局批准在东总建立以刘澜波为书记的党组，领导东总的各种活动。

其后，东总又在济南、上海、南京、武汉、安徽、洛阳、绥远、西安及延安等地建立了分会或通讯处，重要事项的决定由刘澜波向党中央周恩来汇报，得到批准后实行。是时，东总是在党的领导下组织规模最大、开展活动最为活跃的一个群众组织，在刘澜波等的具体领导下，为组织最广泛的东北流亡人士继续奋斗作出了重要贡献。该组织虽然在1942年被国民党反动政府勒令取消，但它的实际活动一直持续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东总在刘澜波的主持下，发表了“死守平津、焦土抗战”的宣言在北平印发，并派出人员赴卢沟桥慰问守军，鼓励士兵奋起抵抗。与此同时，还在北平组织劳军，进行

抗日宣传。

8 月,上海沦陷。周恩来指示东总由南京撤退到武汉,从此,东总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活动。周恩来对东总的各种指示，均由刘澜波传达贯彻。这时,刘澜波除任党组书记外,还兼任总会的秘书长。东总会员已达 10 余万人。

东总迁到武汉后，周恩来通过刘澜波等东总领导人，与东北军一些将领及东北各界人士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调动各种积极因素营救张学良将军，指出东总的所有活动必须本着坚持抗战到底，恢复一切失地，打到鸭绿江边的方针进行。刘澜波在领导东总的工作中坚定不移地贯彻了这一方针，在当时十分艰难的形势下使东总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东总所办的《反攻》半月刊，是当时在抗战中心武汉宣传抗日最有力的刊物之一。刘澜波经常以笔名蓝渤撰写文章，结合时局的发展对全民族抗日到底等问题进行了有力的宣传，特别是针对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谬论及压制东北军的抗日要求等问题进行了巧妙的揭露和批判。

为了给抗日根据地培养、输送干部，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东总党组开办了一个短期训练班，由刘澜波亲自主持。这个训练班的学员结业后，除了有部分人员分配到太行山游击区外，还通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为安徽第五战区李宗仁部派去了部分学员。

1938 年秋武汉撤退前,按上级党的决定,阎宝航、于毅夫等人随总会迁往重庆，高崇民、车向忱等人去西安主持西安分会，刘澜波去延安组织东总延安通讯处。九十月间，刘澜波经西安与张学思等到达延安。

1939 年 1 月，刘澜波参加了延安马列学院的学习，他是众所公认的能用马列主义理论结合中国的革命实际钻研问题的学员之一。结业后被分配到中央统战部，继续做有关东北的统战工作。

1942 年延安整风运动的后期，刘澜波由统战部调到了中央党校一部。在一种极‘ 左 ’思潮的统治下,他竟成为‘ 抢救运动 ’中被重

点审查的对象。在较长的审查过程中，党中央所了解到的正是他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因而在整风审干 要结束时，由周恩来副主席代表党中央郑重宣布：“中央认为东北军的党经过整风证明是我们的党,而且是有成绩的党。”刘澜波的“问题”得到解决后,即参加了中央领导下的东北工作委员会，对当时沦陷区开展有关东北的工作。

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刘澜波作为代表，5 月 22 日在大会上作了关于党在东北工作的发言，号召流亡在关内的东北籍各界人士组织起来，准备打回东北去。这个发言受到了在各地的东北人士的热烈拥护,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45 年 9 月中旬，刘澜波被指派负责选调干部组织干部团，并在干部团成立后任三营营长。刘澜波率领三营干部 200 余名从延安出发开赴东北，担任安东省政府副主席，实际主持省政府工作。领导开展了镇压汉奸、恶霸、反革命分子的群众运动,认真抓好经济工作，使人民群众受到振奋，社会秩序得到稳定，工商业得到恢复和发展。

1948 年辽东省成立后，刘澜波任省政府主席，省委副书记。

1950年,刘澜波调任中央燃料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抗美援朝初期，他还担负着后勤方面的领导工作。1955 年成立电力工业部,他出任电力部的部长、党组书记。1956 年出席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10 月,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提出在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电力工业必须先行一步的重要思想。后来,他还提出“有水的地方多搞水电,有煤的地方多搞火电,水火并举,因地置宜”的建议,得到中央的同意。他还重视科学管理，重视知识，爱惜人才，保护干部，积极筹建了北京矿业学院、石油学院和电力学院，有计划地抓好干部的培训工作。1958 年至“文化大革命”前,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书记等职务。

“文化大革命”中,刘澜波身陷囹圄,他不顾自己身受迫害,还写信给周恩来、叶剑英,请中央追认为东北军联共抗日而牺牲的董道泉烈士为中共党员。

“文化大革命”后,刘澜波恢复了工作。1979年2月,刘澜波重新出任电力部部长,党组书记,不久又被增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9月,十一届四中全会召开,他被增补为中央委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提出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要求,刘澜波根据自己年高体弱的情况,一方面主动向中央提出,希望在组织上安排干部的时候让他退下来;另一方面以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和高度的责任感,积极推荐年富力强的优秀同志来接班,特别是力荐李鹏为电力部部长,使电力部的新老干部交替工作顺利稳妥地进行,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赞扬,称他为“党内开明人士”。

由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刘澜波的身体受到严重摧残。但他不顾医护人员的劝阻,经常工作到深夜,即使在病势已经非常严重的时刻,他还在惦念着电力事业的发展,还嘱托有关同志做好整理东北军党史的工作。

1982年3月5日,刘澜波与世长辞。

刘澜波为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以及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特别是为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军中的工作,做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他不计荣辱,不避艰险,勤勤恳恳为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正如邓颖超在题词中对他评价的那样:“风范长存,精神永在!”

(周平生整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